

【事业·管理】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变迁： 曲折发展与非正常恢复时期(1956—1976年)(一)

●谢运萍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受“向科学进军”浪潮的影响转为了图书馆学系,开始实施本科教育。后受1958年至1960年和1966年至1976年间政治运动的侵扰,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历经了一段曲折发展与非正常恢复的演变。在1956年至1976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先是在“效仿苏联”“以苏为鉴”理念下分别制定了两个四年制本科课程体系,后又参照1958年至1960年间的教育方针制定了“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学计划。20世纪60年代初,图书馆学系曾对既有课程体系进行过回归教学的调整。1972年,图书馆学系在停招六年后重启招生,随后即制定了面向工农兵大学生的二年制教育革命计划。此时期,图书馆学系的课程体系深受国家政治与教育政策的影响,其课程内容呈现泛政治化特点,课程结构呈现“拼合化”特点,课程实施则采取了“半工半读”“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做法。

[关键词]图书馆学专业 课程体系 北京大学 教育史

[中图法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2)02-0007-07

[引用本文格式]谢运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变迁:曲折发展与非正常恢复时期(1956—1976年)(一)[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2(2):7-13

1 政治运动中的图书馆学系

新中国在成立不久后,即开始了对旧课程的改造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至1956年,已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1956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要求“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指出“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要“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1]。这场会议不仅使“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也使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焕发了新生机。1956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得以“转科为系”,系下设图书馆学专业,开始实施四年制的本科教育。为此,两校的图书馆学系共同草拟了一个本科教学计划。在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即招收了61名本科新生,人数超过前两年的招生总和。

新中国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苏联为蓝本的,但在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十月事件后,我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1957年6月,《高等教育部关于改变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办法的通知》规定自1957年

下半年起“各类专业各个年级的现行统一教学计划一律改为参考性文件”^[2],高等学校重新获得了一些课程教学的自主权。虽然教育政策有所调整,但在1956年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依然惯性地遵循着苏联模式的基调,中苏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依然密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在1955年7月至1956年间与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交往密切,据刘国钧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曾受过雷达娅专家的指导^[3]。

1957年4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发布,邀请党内外人士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图书馆学系的全体师生于5月23日举行了座谈会,对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和学校关于图书馆学系的一些政策、做法进行了批评。系主任王重民先生提出,图书馆学系学制反复变动了好几次,给国家培养合格的图书馆学干部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周文骏先生例举了自己曾被分配到中学教语文和俄语的经历,批评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分配的不合理;一些学生指出,老师们盲目地学苏联而不结合中国实际,教条主义倾向非常严重,教学质量不高^[5]。这些中肯的批评,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学系师生们对于

教育活动的真实感受。1957年6月,因在整风运动中冒出了一些极端言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发布,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由于这场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图书馆学系的一些师生在当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教育方针作了阐释:“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1958年6月,陆定一在“全国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8]。国家开始对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给予空前的重视,希望以此改变学校教育中忽视政治、脱离生产的倾向,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发布,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9]。此外,高等教育部还在1957年底要求全国高校在各年级开设一学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与党的文件,而原有的政治课则停开^[10]。当时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形式主要有:在学校举办的农场、工厂中劳动,下乡、下厂劳动,参加校内外外的公益劳动和参与社会调查。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政治任务挤压了课程教学的时间,各高校不得不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在1958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就因政策原因前后调整过两次教学计划。

至1958年底,中国的高等教育风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人们认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学校内部的结构应该是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基地^{[11]644}。且在过去一年的教育改革中,过多的生产劳动影响了教学工作,使教学出现“重实践、轻理论”等问题。1959年年初,北京大学组织各专业制定了“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计划,并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增加了理论课程的比重^{[11]647}。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即于1959年2月制定了《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改革方案》。1959年4月,《人民日报》进一步发文指明全日制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高校的“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服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12]。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59年8月再次调整了教学执行计划,并恢复了曾停开的马列主义政治课程,但这种以教学为中心的政策风向并没有

持续太久。1960年,国家重新强调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逐渐向1958年回归。图书馆学系也于1960年6月制定了面向1960级新生的教学计划和各年级老生的过渡计划。

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生产劳动的介入和“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模式的推出对高校教学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据图书馆学系1957级学生回忆,仅在1958年间,1957级的学生就参与了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北京大学“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修建、房山县惠南庄秋收和翻土地,还于10月中下旬至1959年1月中旬赴海淀区四季青公社半工半读^[13]。图书馆学系1958级学生曾在文章中描述过在海淀人民公社半工半读的经历:“(我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参加社会活动。”“现在我们只开三门课,即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政治课和俄文”^[14]。文中还提到,1958级的学生们对于“只讲条文而不接触实际的教学方法很不满意”^[14]。除了到邻近的海淀人民公社进行劳动,1958年至1959年间,图书馆学系的师生还分别被下放到了河南郑州、安阳,河北昌黎、徐水,山西运城等地参加劳动教育^[15]。

除了教育政策,在1958年至1960年间,政治运动也对高等学校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其教学工作中频现种种违背教学规律、科研规律的做法。一方面,高等学校在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方面出现了“多快好省”的冒进倾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师生曾在1958年暑假的40天时间里调查了122个图书馆,写出了58篇调查报告、8篇批判资产阶级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论文、4篇专题论文、4本课程教材和专著《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6]。另一方面,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被混淆,一些学术内容被否定为“封资修的毒草”,一些学者被错判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意识形态语言开始在学术话语体系中泛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一些自编课程讲义和教师文章著作被批判为脱离政治、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16],刘国钧教授也被错当成“资产阶级白旗”^[17]。这些批判使得原有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被打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师生关系也变得紧张、微妙起来。

为恢复正常生产秩序,1960年底,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文教领域也开始落实“八字方针”,并强调“高等教育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18]。北京大学重新对教学、生产、科研的时间作了规定,保障了各专业

课堂教学的时间^{[11]673},图书馆学系也对各年级的课程学习情况进行了梳理,于1961年7月制定了针对各年级的过渡教学计划。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也称《高校六十条》),指出了过往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劳动过多”“课程不适当地大合大改”等问题,对今后的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等工作进行了明确规范^[19]。高等学校彻底从政治风波中缓过劲来,开始对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整顿。1961年、1962年,图书馆学系因整顿工作停招两年。停招期间,图书馆学系对过去几年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反思了从前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够完整、课程知识性不够、“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比例不恰当、培养目标与国家需要不对口径等问题^[20]。当时,图书馆学、目录学两个教研室都认为图书馆学知识“四年学不透,应该学五年”^[21],初步制定了一个五年制的教学计划,但后因五年制不被批准,又不得不将五年制教学计划修改为四年制。

1962年,国家决定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以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为主,在农村以“四清”运动为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四清”运动逐渐扩大化,发展为了“1966年至1976年间政治运动”的预演。受政治运动影响,教育部在1964年的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评了现行教育中存在的“片面强调智育”等问题^[22]。1964年1月底,北京大学召开系主任联席会议,决定文科实行半工半读^{[23]137}。随后在3月、4月,进行了教学改革,要求各专业“精选课程内容,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倡导文科教育“少而精”^{[11]721}。自1964年开始,北京大学的师生被陆续抽调至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而未下乡的师生则在校内开展“校系阶级斗争”^{[23]131-132}。1965年6月,北京大学将“四清”列入教学计划,规定社会科学各专业均要参加一期农村“四清”运动和一期城市“四清”运动(或主要过程),参与时间约为一年,文科每周的课堂教学时数不得超过20小时^{[11]742},图书馆学系因此对教学计划进行了修改^[24]。不过,1965年修订的教学计划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它被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给终止了。

1966年,国家宣布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25],并决定改革高校招生工作,拟取消招生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26]。但直到1969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都未能顺利重启。在

此期间,各高校重拾起“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并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5级的本科生就曾于1969年被工宣队带领至北京市平谷县的山东庄挖防空洞^[27],王重民先生曾被安排到校“黑帮”大院劳动^[28],周文骏先生也曾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进行劳动再教育^[29]。

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批准招收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学员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招录,其中大部分人是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贫下中农、工人、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年龄在20岁左右,一部分人则是不受文化程度与年龄限制的实践经验丰富的贫下中农和工人^[30]。工农兵大学生时期的高等教育倡导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新型教学方式^[31];倡导“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32]149},工农兵与教师合作来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31]。1972年,图书馆学系被纳入北京大学招生规划,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图书馆学系面向工农兵大学生制定了二年制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革命方案,并对“图书馆学基础”“中国书史”等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大幅修改。

在1974年至1975年间,全国陆续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教育界、学术界则掀起了广泛的“儒法斗争”讲习活动,高等学校纷纷注释起法家著作,同时改革教材,对旧教材的“尊儒反法流毒”进行肃清。受政治运动影响,图书馆学系曾于1974年、1975年两次对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修改。在1974年的修改中,图书馆学系着重强调“批林批孔”,并取消了对工农兵学员的考核制度。在1975年的修改中,图书馆学系增添了意识形态语言与教育革命口号,并对业余教育、教材改革、教师队伍改造等方面作了具体安排。在1966年至1976年政治运动期间,高等教育丧失了其独立性与自主权,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处于其中,受政治裹挟,随波逐流。

2 图书馆学系的课程体系

2.1 “效仿苏联”与“以苏为鉴”的课程体系

1956年11月,高等教育部正式发文同意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至1957学年度入学新生改为本科,学习年限为四年^[33]。早在1956年7月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专修科即得到了可以改制的消息,一同制定了四年制的本科教学计划。当时两校拟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大型省市级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政府机关及科研机构图书馆的干部”和造就“图书馆学校的师资”^[34]，与图书馆学专修

科时期的培养目标一脉相承。两校图书馆学专业 1956 年 8 月拟定的教学计划进度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1956 年 8 月)

次序	课程名称	时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表							
			I 学年		II 学年		III 学年		IV 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每周时数										
1	中国革命史	102			3	3				
2	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论	102							4	3
3	政治经济学	136					4	4		
4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102	3	3						
5	中国通史	140	4	4						
6	世界史	140	4	4						
7	中国文学史	280	4	4	4	4				
8	世界文学	210			4	4				
9	科技概论	140			4	4				
10	俄文(或英文)	380	4	4	4	4	4	4	4	
11	体育	140	2	2	2	2				
12	教育学	54		2						
13	中国图书史	68	4							
14	图书馆学	241	4				3	3	3	
15	藏书与目录	348		4	4	4	4	4		
16	外文图书编目法	51								3
17	工具书使用法	51			3					
18	普通目录学	123				4	3			
19	专科学目学	208						4	4	4
20	图书馆事业史	51								3
21	专题讲授	105							3	3
22	教学实习	102				3		3		
23	生产实习									√
24	第二外国语(加修)(任选一种)	280			√	√	√	√		
25	心理学(加修)	51					√			
26	儿童图书馆学(加修)	54						√		
	总时数	3 274								

注:总时数不包括加修时数,此教学计划表没有对课程实施方式进行安排。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教学计划[A].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GL0301958-0010.

与 1955 年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三年制教学计划相比,四年制本科教学计划并没有在课程内容上作大幅改动,所开设的主要课程与之前一致,两者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课程课时与加修课上。由于学习年限的延长,四年制教学计划的必修总时数有所增加,新增的学时主要分配在文化课与专业课上。图书馆学专业修习的政治课程依旧是“老四门”,但政治课总学时由原来的 498 学时缩减为了 442 学时,占去总体课时的 13.5%。专业修习的文化课程依旧是“中外

史+中外文学史+教育学”的组合,其中“中国文学史”的学时增加至 210 学时,是之前的两倍,文化课程及外语课程占去总体课时的 41.1%。在专业课方面,除“普通目录学”“专科学目学”外,其他课程的学时均有所增加。其中,“藏书与目录”由 262 学时增加至 348 学时,“图书馆学”由 211 学时增加至 241 学时,“专题讲授”由 36 学时增加至 105 学时,专业课学时占总体课时的比例上升为 41.2%。新增的“工具书使用法”是从“普通目录学”的教学内容中分离出来

的,它是王重民先生造诣颇深的一门课;新增的“外文图书编目法”,图书馆学专业在更早之前曾开设过,该课程主要讲授外文图书整理知识。当时,北京大学各专业普遍设置了加修课,以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自我提升。图书馆学专业重视语言技能,因此“第二外国语”被列为加修课之一。苏联图书馆教育重视心理学与儿童少年图书馆学,因此“心理学”“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也被列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加修课。1956年的教学计划是教员们出于加强学生文化基础、专业理论、业务技能的考虑制定的,它虽依旧深受苏联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却不再对讲授、讨论、实习等教学方式进行调整,给予了教师教学更大的自

主空间。

1957年,由于“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教育部门开始强调起“以苏为鉴”,要求高等学校在学习苏联时更多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取消了“教学计划全国统一”的制度。1957年10月至11月,图书馆学系对1956年的本科教学计划进行了一些调整,调整的重点是:不再效仿苏联集中建立专业课,将“大课”重新拆散为“小课”;恢复“目录学引论”“中国目录学史”等传统目录学课程;恢复选修课,将“中国通史”“教育学”等原必修课程改为选修,将“版本学”“史料学”等传统课程列入选修。具体的教学计划进度表如表2所示。

表2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草案(1957年10月)

次序	课程名称	时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表							
			I 学年		II 学年		III 学年		IV 学年	
			18 周	17 周	18 周	17 周	18 周	17 周	18 周	12 周
			每周时数							
1	政治课	493	4	4	3	3	4	4	4	3
2	中国书史	54	3							
3	图书馆学引论	54	3							
4	图书馆目录	226		5	5	3				
5	图书馆藏书采购与组织	54			3					
6	读者工作	51				3				
7	图书馆组织	54					3			
8	外文藏书与目录	72							4	
9	图书馆事业史	36								3
10	目录学引论	51		3						
11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54	3							
12	中国目录学史	68				4				
13	专科学目录学	159					3	3	3	
14	图书馆参考工作	36								3
15	专题讲授	140						4	4	
16	科学技术概论	212	4	4	4					
17	中国文学史	140	4	4						
18	西洋文学	105			3	3				
19	苏联文学	105			3	3				
20	第一外国语(俄文或英文)	385	4	4	4	4	3	3		
21	体育	140	2	2	2	2				
22	选修课	365 - 495					7 - 9	7 - 9	4 - 6	4 - 6
23	学年论文								√	√
24	生产实习					√				√
25	总时数	3 054 - 3 184								

注:在第4学期结束后进行3周至4周生产实习,第8学期从第14周开始进行5周至6周生产实习。

选修课包括: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史料学/文艺学引论/中国哲学史/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图书分类编目问题/版本学/儿童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与科学图书馆/目录学研究/外文参考书/第二外国语(日、英、德、法等)/中国文学名著选/其他(凡外系开设课程,经系主任研究认为可选修者)。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教学计划(草案)[A].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GL0301958-0010.

在1957年的教学计划中,原“图书馆学”课程被拆开为“图书馆学引论”“读者工作”“图书馆组织”三门课程,原“藏书与目录”课程被拆开为“图书馆目录”“图书馆藏书采购与组织”两门课程。此前因全面学苏,发源于中国本土的一些图书馆学、目录学课程被取消,但在1957年的教学计划中,“目录学引论(原‘目录学概论’)”“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又重新进入了课程体系。除去课程组织方式、课程内容的调整,1957年的教学计划还调整了部分课程的学时,如减少了“专科学目学”“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学时,增加了“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学时。图书馆学专业对科技知识教学的重视,与当时“向科学进军”的社会风潮相呼应。1957年的教学计划重新采用了“必修+选修”的课程体系,图书馆学专业所列出的16门选修课,部分曾是此前的必修课,如“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世界史’课程的一部分)”“教育学”“史料学”;部分曾是1951年曾拟开设的选修课,如“版本学”“儿童图书馆学”;部分是根据教师所长及学生就业分配情形开设的,如“图书馆图书分类编目问题”“目录学研究”“外文参考书”“大学图书馆与科学图书馆”;“文艺学引论”“中国哲学史”“逻辑学”“第二外国语”“中国文学名著选”等多元选修课的设置,也迎合了当时图书馆专业的知识技能需要。1957年的教学计划调整体现了图书馆学系教员们对“专课专上”课程组织方式的认可和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传承之心。同时,教员们对苏联的图书馆学教育也持有辩证吸收的客观态度,并没有全然推翻旧有的课程内容。此教学计划是图书馆学系将苏联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次尝试,是在新社会时期构建中国图书馆学本科课程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未完待续)

参 考 文 献

- [1]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53-561.
- [2] 高等教育部关于改变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办法的通知[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62.
- [3] 刘国钧.回忆雷达娅专家[J].图书馆工作,1955(1):29-31.
- [4]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57-758.
- [5] 周文骏.图书馆教育走向何方——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师生座谈会[J].图书馆工作,1957(7):15-18.
- [6]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63.
- [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录)[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25-727.
- [8] 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38-839.
-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58-861.
- [10]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89.
- [11]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2] 《人民日报》社论: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92-893.
- [13] 曾浚一,金恩晖.此情可待成追忆——记刘国钧教授指导我们写作图书馆学论文的岁月[J].图书情报工作,2007(3):18-24.
- [14] 任双燕.我们在海淀人民公社半工半读[J].图书馆工作,1959(2):47-48.
- [15] 韩淑举.图书馆界“下乡上山”运动的历史考察(1958-1960)[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1):88-97.
- [16] 史永元.苦战四十天,向科学研究大跃进——记北大图书馆学系暑假科学研究工作[J].图书馆学通讯,1958(5):13-15.
- [17]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6年级“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小组.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J].图书馆学通讯,1958(5):3-6.
- [18]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7-1029.
- [19]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59-1066.
- [20] 1962年9月10日在全系教师会上的报告[A].北京: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GL0301962-0007.
- [21] 关于教学计划的讨论[A].北京: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GL0301962-0007.
- [22] 刘季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50-1255.
- [23]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4] 图书馆学系1965级教学计划(草案)[A].北京: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GL0301965-0003.
- [2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02.
- [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8:1404-1405.

- [27] 韩淑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锦贵教授[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2):1-4.
- [28] 刘脩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附《著述目录》)[J].图书馆学研究,1985(5):28-55.
- [29] 晓章.访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周文骏先生[J].黑龙江图书馆,1989(1):63-65.
- [30] 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61-1462.
- [31]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旗》杂志署名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1462-1467.

- [32]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
- [33] 图书馆学系专修科改为四年本科[A].北京: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IGLO301956-0005.
- [34] 张树华.早期的北大图书馆学系[J].黑龙江图书馆,1987(5):64-66.

[作者简介] 谢运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2-01-15

(刘平 编发)

The Transi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Peking University: the Period of Tortuous Development and Abnormal Recovery (1956 to 1976) (One)

Xie Yunp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1956,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ave of "marching to the science", the Library Science Special Course in Peking University chang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started it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terfered by the political movement from 1958 to 1960 and from 1966 to 1976,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library science major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tortuous development and abnormal recovery. From 1956 to 1976,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Peking University created two different four-year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systems following the idea of "imitat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aking the Soviet Union as a lesson", and then made a teaching plan which combines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ve labor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olicy from 1956 to 1976. In the early 1960s,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adjust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to return to teaching. In 1972, after six years of suspension,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restarted the enrollment and made a two-year education revolution plan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workers, farmers and soldie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 course content was politicalized, the course structure was scrambled, and the curriculum was implemented under a mode of "part-time work and part-time study" and "combining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ve labor".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Curriculum system.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al history.